

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

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

经济杠杆论

王亘坚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杠杆论 / 王亘坚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8

(津沽名家文库. 第一辑)

ISBN 978-7-310-05827-3

I. ①经… II. ①王… III. ①经济杠杆—研究 IV. ①F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1532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运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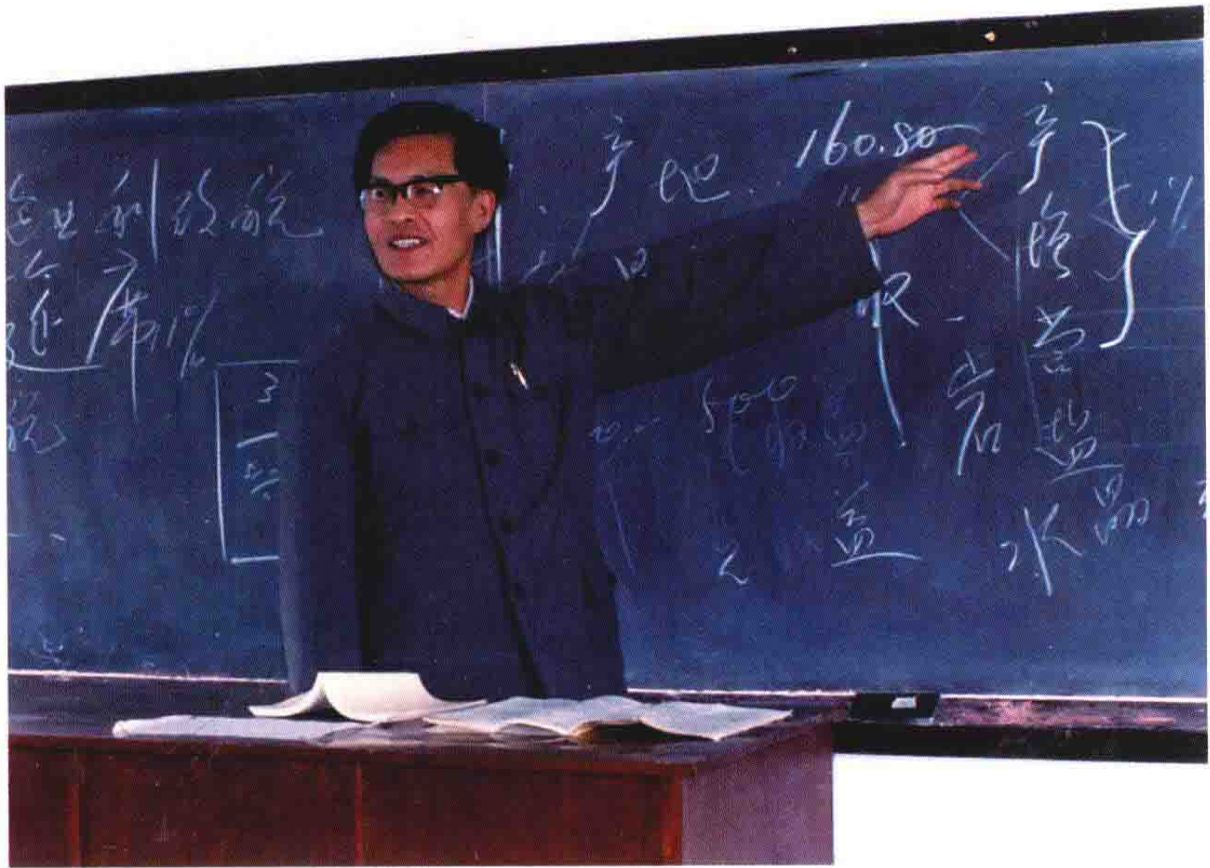
*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6 插页 233 千字

定价: 6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王亘坚先生(1923—2018)

第一章 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诸问题的相互关系
的论述
马克思指出，~~国家~~国家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行使行政权力~~和~~对其他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是更高级的
生产关系，它比旧制度更优越，它使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
力的发展，不断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地关系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对
生产关系在~~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造过程中，生产关系
因此，要了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就必须从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始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发展的
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造。这种改造
不断、周而复始地进行，同时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出版说明

津沽大地，物华天宝，人才辈出，人文称盛。

津沽有独特之历史，优良之学风。自近代以来，中西交流，古今融合，天津开风气之先，学术亦渐成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院系调整，学科重组，南北学人汇聚天津，成一时之盛。诸多学人以学术为生命，孜孜矻矻，埋首著述，成果丰硕，蔚为大观。

为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天津学术发展的面貌及成果，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津沽名家文库”。文库的作者均为某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所收录的著作或集大成，或开先河，或启新篇，至今仍葆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论著的价值已经从单纯的学术层面生发出新的内涵，其中蕴含的创新思想、治学精神，比学术本身意义更为丰富，也更具普遍性，因而更值得研究与纪念。就学术本身而论，这些人文社科领域常研常新的题目，这些可以回答当今社会大众所关注话题的观点，又何尝不具有永恒的价值，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道路点亮了一盏盏明灯。

这些著作首版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近几十年来多未曾再版，既为学林憾事，亦有薪火难传之虞。在当前坚定文化自信、倡导学术创新、建设学习强国的背景下，对经典学术著作的回顾

与整理就显得尤为迫切。

本次出版的“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包含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五个学科的名家著作，既有鲜明的学科特征，又体现出学科之间的交叉互通，同时具有向社会大众传播的可读性。具体书目包括温公颐《中国古代逻辑史》、马汉麟《古代汉语读本》、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顾随《顾随文集》、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稿》、雷石榆《日本文学简史》、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王达津《唐诗丛考》、刘叶秋《古典小说笔记论丛》、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漆侠《宋代经济史》、来新夏《古籍整理讲义》、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季陶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杨敬年《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王亘坚《经济杠杆论》等共二十种。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的更新和学科的进步，某些领域已经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对于著作中的部分观点还需在阅读中辩证看待。同时，由于出版年代的局限，原书在用词用语、标点使用、行文体例等方面有不符合当前规范要求的地方。本次影印出版本着尊重原著原貌、保存原版本完整性的原则，除对个别问题做了技术性处理外，一律遵从原文，未予更动；为优化版本价值，订正和弥补了原书中因排版印刷问题造成的错漏。

本次出版，我们特别约请了各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为每部著作撰写导读文章，介绍作者的生平、学术建树及著作的内容、特点和价值，以使读者了解背景、源流、思路、结构，从而更好地理解原作、获得启发。在此，我们对拨冗惠赐导读文章的各位学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同时，我们铭感于作者家属对本丛书的大力支持，他们积极

创造条件，帮助我们搜集资料、推荐导读作者，使本丛书得以顺利问世。

最后，感谢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领导小组的关心支持。希望本丛书能不负所望，为彰显天津的学术文化地位、推动天津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贡献，为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经济杠杆论》导读

武彦民

王亘坚（1923—2018），我国著名的财政经济学家，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兼任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杠杆研究会副总干事、天津市经济杠杆学会会长及名誉会长，天津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等，2017年获“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经济杠杆论》是王亘坚教授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作为王教授指导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我十分荣幸为该著作撰写导读。

一、王亘坚先生生平

王亘坚生于1923年10月2日，河北丰润人。他的青年时代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整日目睹日寇汉奸横行，大众民不聊生，国家积贫积弱，个人早早就体味了生活的艰辛苦涩，也萌生了外出求学、寻求真理、改变命运、强国富民的念头。

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王亘坚即考入当时北平的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大学的经济系，开始接受正规的经济学理论训练。尽管时局动荡，但这一阶段的学习为他日后从事财政理论教学和

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同时也使他对经济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有了最初的认识。入学不久，王亘坚就投入了火热的学生运动，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并开始接触一些来自解放区的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

1947年6月2日，国民党军警突袭了进步学生组织，逮捕大批学生，查封进步书刊，当时的北平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事先得到风声的王亘坚被迫到北平崇文门外的一个同学家中暂避，并于第二天秘密离开北平，在天津隐蔽两周后，待局势稍有缓和，他才重返学校，继续学业。次年秋天，在组织的帮助下，他与部分同志一道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进入了解放区，后进入党中央在河北省正定县创办的一所大学——华北大学学习。华北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当时的校长为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先生。

1949年后，华北大学迁入北京，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1950年10月1日，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大学。王亘坚于1950—1952年间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当时未实行学位制），同时给该校第一期本科生授课，边学边教，在教学相长中迅速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1954年，刚过而立之年的王亘坚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他似乎进入了自己学术生涯中可以大展身手的黄金时期，他一方面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另一方面积极地从事学术研究。他勇于坚持真理，崇尚科学，不畏权威，敢于向当时的苏联专家提出自己不同的学术见解。但在当时政治运动的背景下，王亘坚未能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讲坛。

1962年，正当王亘坚抑郁不得志时，当时的河北财经学院（天津财经大学的前身）向他发出了邀请。出于对新生活的向往，以

及对重归教学岗位的渴望，王亘坚告别了中国人民大学，调入河北财经学院，这使他获得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他蜗居在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小屋，在教学科研岗位上辛勤耕耘，编教材，写论文，著书立说，著名的《论财政学的对象》一文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完成的。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施多个方面的拨乱反正，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王亘坚也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他决心把全部的才华和精力贡献给他挚爱的教育事业和财税研究工作。王教授发起并主持编写了我国“文革”后第一部全国高等财经院校统编教材《社会主义财政学》，参与编写了《经济大辞典·财政卷》，主编了财政和财务会计方面的大型工具书《财会知识手册》，开创了经济杠杆理论研究新领域，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杠杆研究会和天津市经济杠杆学会，筹建天津财经学院（今天津财经大学）税收学专业和国际税收专业，担任天津财经学院财会系系主任和财政系首任系主任，在天津财经学院设立了我国第一批财政学硕士点，培养了数十位财政学专业研究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不停地思考着、探索着、奔走着，一批极富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他也不停地在各种场合为改革发展和反腐倡廉鼓与呼。

1994年，已过古稀之年的王亘坚教授从他奋斗了四十余年的教学岗位上离休了。但他离而不休，依然关注着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的改革与发展，关注着财政学科的创新，关注着国计民生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处境和出路，不遗余力地为各项改革进言献策。离休后的十多年间，他策划并参与主持了第三、第四次全国经济杠杆理论讨论会，体制改革与经济杠杆专题研讨会、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状与对策高级研讨会、全国财政学科博士点后续建设座谈会等一系列大型学术活动，甚至在九十高龄之际，还

在听取本校承办的全国高校财政教学研讨会的准备情况汇报，为该会议的成功举办提供指导。

2017年4月，在获悉自己获得国家财政部、中国财政学会颁发的“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时，激动感慨之余，王教授在病榻上书写获奖感言，同年12月在病房接受中国财政学会领导亲自颁发的获奖证书和奖牌时，依然思维清晰地梳理自己的学术经历，抱病录制致谢视频。

凡是与王亘坚教授接触比较多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王先生为人光明磊落，处事态度十分认真，分析问题深刻透彻，语言表达直截了当，逻辑严谨，堪称纯粹而透明的学者，如果他认为你的说法不对，或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会当面批评你，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无地自容，下不来台。但接受批评的人也知道，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率真、耿直、坦荡、无私。

王亘坚教授的品性在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研究中也表露无遗。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他往往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对寻常百姓的不公正遭遇，他会长吁短叹，牵肠挂肚；对有些不负责任、轻描淡写、态度暧昧的表态，他会争得面红耳赤；而对于朋友、同事、学生的求助，他会义无反顾，热情相帮。在他的周围，很少有人没有接受过他的帮助，有些帮助对求助者的一生都是决定性的。对一些不正之风或错误的做法，很多人往往会敷衍一句：“不太合适。”但王亘坚教授会严肃地更正为：“不是‘不太合适’，而是‘太不合适’！”因为他爱憎分明的个性，许多老前辈成了他的挚友，许多年轻同志成了他的忘年交。

2018年8月7日，王亘坚教授在同病魔做了长期抗争后，带着对教学研究事业和对家人、挚友、学生的万般不舍，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五岁。

二、王亘坚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

众所周知，王亘坚教授始终坚持的学术品格是真理至上，独立思考，求真务实；他平生最厌恶的学术作风是道貌岸然，华而不实，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不唯书，不唯上，凡事以实际为根据，以真理为准绳。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发表一大批旗帜鲜明、经得起推敲的学术成果，也才能够获得财税学界广泛和长久的尊重。

王亘坚教授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围绕三条主线展开的。

（一） 财税基础理论研究

财税基础理论是王亘坚教授最早触及的研究领域，自 20 世纪 50 年代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时起，他就在财政基础理论的诸多研究方向上笔耕不辍，取得丰硕且极富见地的研究成果。

1. 提出税收“三性”的形式特征理论

税收的三个形式特征——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是我国所有从事与财税相关工作的人熟知的常识。该理论的最初贡献者正是王亘坚教授。提出背景是 20 世纪 50 年代在我国财税学界展开的关于苏联周转税“非税论”的大讨论。

20 世纪 50 年代初，苏联财税学界根据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理论，兴起了一股苏联的周转税不是税的风潮。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29 卷）“税收”条目中写到：“在苏联，形式上存在着国营企业上交预算的税收。而实际上，这些收入就其本质来讲，并不是税收，因为它们的所有制形式并没有变化。国家不会自己向自己征税。”^①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有一段看似“不容争辩的真理”：“虽然国家集中的纯收入的一部分叫

^① 觉·承：《苏联周转税怎样确定纳税环节和纳税人》，《人民税务》，1956 年第 2 期。

做‘周转税’，但是按其本性来说，它不是税，也不是对劳动者的收入的某种扣除。（例如工资的高低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根据不断提高工资水平的必要性，同时估计到包括周转税在内的消费品价格来决定的。）”我国有些学者以此为根据，也站在“非税论”一边，撰文指出：“实际上周转税不是税，因为它不是从劳动人民收入中征收来的，而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创造的积累的一部分。”^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完全消除了税收的这种内容，而产生了新的内容。税收乃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计划地分配国民收入的方法，乃是国家发展生产和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地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的工具；它仅仅在形式上最无偿的缴纳，而实际上通过国家预算直接或间接地用于人民，它是具有返还性的。至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缴纳的税，按其本质来讲，并不是税。”^②

针对这种苏联周转税“非税论”的观点，王亘坚教授在《有关实行周转税的若干原则问题——为参加“人民税务”的研究与讨论而作》中指出，他不同意苏联经济学界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这个意见，自然，也就不能不反对某些人的国营企业纳税不是税的观点。他写到，“税收乃是一种历史性的财政范畴。因此，它的性质和作用不能不随着国家的性质以及生产关系的性质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作为一种财政范畴的税收，它总还有其一般的特点，也正由于它具有税收的这些一般特点，才使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来利用税收这一财政范畴为自己服务。”“周转税带有税收的这些一般特点——缴纳的强制性，缴纳的无偿性，数额的固定性等等”，因此，“‘非税论派’，是毫无根据的”，“税收这一财政范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必然，尽管有些

① 力立：《学习苏联实行周转税的先进经验改革我国的税收制度》，《人民税务》，1956年第9期。

② 南冰，索真：《学习苏联周转税的体会》，《人民税务》，1955年第1期。

人不承认它的存在”。^①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非税论”在我国财税界引起很大的混乱，直接导致了1959年的“税利合一”（实质上是取消税收）试点，给我国财税事业造成了损失。需要注意的是，王亘坚教授在本文中的看法不仅驳斥了“非税论”的观点，更是首次归纳了税收的三个形式特征——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该观点不仅在随后《人民税务》的相关讨论中被不断引用^②，同时也被我国财税界广泛接受，在几乎所有的财政、税收教科书和工具书中被广泛引用。

2.发现并坚持“价值分配论”的财政本质观

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国财税学界对所谓财政本质观的讨论曾经盛极一时。“国家分配论”“价值分配论”“货币资财论”“货币关系论”“分配关系论”“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共同需要论”“国有资产资金运动论”等各种观点纷纷问世，流派纷呈。“价值分配论”是王亘坚教授首次提出并毕生坚持的财政本质观。

1964年在大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财政基础理论讨论会是我国财政理论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王亘坚教授在会上提交的《论财政学的对象》的论文中，提出了“价值分配论”的财政本质观，他的这一观点冲破了当时由苏联专家提出的居主流地位的“货币资财论”，也对国内财政学界多数人主张的“国家分配论”发起了挑战，在财政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认为，关于财政本质的一些观点，诸如“货币资财论”“货币关系论”“分配关系论”等，“都未能确切地概括出财政这种特殊社会现象的特殊本质”，财政现象是国家对价值的分配，财政现象的本质是国家分配价值

① 王亘坚：《有关实行周转税的若干原则问题——为参加“人民税务”的研究与讨论而作》，《人民税务》，1956年第13期。

② 钟瑞庭：《我对周转税本质问题的一些看法》，《人民税务》，1956年第17期。

所发生的分配关系。“古今中外，所有各个社会形态下的财政现象，都属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特定的部分，就其一般性质说来，乃是国家对价值的分配。”“国家参与价值的分配，必然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在各个阶级之间形成一系列的分配关系，而这些分配关系——国家分配价值所发生的分配关系，就是财政现象的本质。”王亘坚教授针对“国家分配论”者特别强调国家财政分配实物的历史，并据此反对“价值分配论”的观点，系统地阐释了如何看待历史上乃至当代依然存在的财政分配实物的现象。他从价值形态的发展过程——由简单的价值形态、扩大的价值形态、一般价值形态、最后到货币形态，具体分析了财政现象如何逐步从一般经济现象中独立出来。王亘坚教授还特别强调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界线，他在论文中写道：“谁也不能否认，在中外历史上，曾有国家分配实物的大量史实，就是在今天，国家也还在分配实物。但是，能不能把所有国家直接分配实物的现象都划入财政范围呢？我看不能。因为这样一来，就势必不能划清国家的财政活动同国家的一般经济活动或物资分配活动的界线，势必不能划清物力和财力的界线。而实际上，财力、物力和人力之间，并不是没有界线的。人力是活的劳动力，物力是物化劳动，财力是物化劳动的价值方面。所以，一般的说，国家直接对实物的分配，是对物力的分配，国家对价值的分配，才是对财力的分配。谈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旧的财政学。某些资产阶级财政学不仅把财力同物力混淆起来，而且把这两者同人力混淆起来，如所谓财政收入中包括力役收入、实物收入、货币收入等等。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把力役征用也算作财政收入，那么，国家或君主掠夺来的奴隶、战争中的俘虏等也成了财政收入了；甚至于，开个玩笑的话，妃子选进宫去也成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了，不是封建国家财政的特点之一是国家财政与国王个人财政含混不分吗？这些当然是

离奇之谈。”几十年过去了，尽管新观点、新学说层出不穷，“价值分配论”也一直没有在财政学界占据主流地位，但王亘坚教授并未改变自己的财政本质观。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的学术观点是自己独立思考、潜心研究的结果，在“主流学派”尚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驳倒他的观点之前，他决不会跟风附和。时至今日，王亘坚教授的“价值分配论”依然在我国财政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①

毋庸讳言，我国财政学界大多认同的财政本质观是“国家分配论”，即财政本质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形成的分配活动和分配关系。对此，王教授在1992年第2期《财政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专门谈到“价值分配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区别：“价值分配论完整地说，实际是‘国家分配价值论’。它与‘国家分配论’的分歧，并不在于分配的主体，而是在于分配的客体。”“‘价值分配论’主张财政是分配社会产品价值的，而‘国家分配论’强调的是国家分配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价值分配论’强调财政不仅与国家有本质联系，而且与商品货币经济有本质联系，并且认为财政现象的产生是随商品内部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的发展，从而价值形态的发展、价值分配现象的产生，以及国家职能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财政只与国家有本质联系，与商品货币经济并无本质联系。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始自50年代后期，明朗化则在60年代中期。”^②

3. 揭示财政运动五大规律

我国财政学界不时会展开关于财政运动规律问题的讨论。有

^① 本段所有引文均出自王亘坚《论财政学的对象》一文，载《财政学问题讨论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年。

^② 王亘坚：《深入探索财政规律 发展财政基础理论》，《财政研究》，1992年第2期。